

罗瑞卿支持爱子造核弹

在我进哈军工前,爸爸郑重地对我说,你要上军校了,我给你们兄弟三人起了名字,叫“箭、宇、原”,就是火箭(导弹)、宇宙飞船(人造卫星)、原子弹。从上哈军工起我就改名为“罗箭”。当时中央决定让他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,受中央直接领导,协助聂帅和贺老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委员会的工作,专门负责组织、协调国防工业建设,狠抓战略武器的发展,也就是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工作。我们的名字寄托着爸爸和他那一辈富国强兵的期望。不但我们兄弟三人走进了部队,我的两个妹妹,也全部被父母送上了国防科技战线。

支持我转入哈军工

我的父亲罗瑞卿,于上世纪初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。他的童年、少年时代,正是我国遭受列强瓜分,战乱不已、民不聊生的年代。他和那个年代的有识之士们一样,苦苦思索着强国之路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,父亲担任首任公安部长,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维护社会治安、改造旧社会陈规陋习之中。他常常对我们这些

子女感慨,我们打了一辈子仗,建立了一个新中国,可建设这个国家就靠你们了,要努力学习,要学好数理化,学好自然科学,将来为国家建设做贡献。

我从“八一”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北京“一〇一”中学,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毕业后到苏联留学,学习最新、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。1958年我毕业时,中苏关系已经紧张,出国留学很困难。为了能学习核技术,我去拜见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伯伯,他告诉我哈军工没有原子专业,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。我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大,读的是原子能系。

没想到,起先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,后来两国关系恶化,他又变卦撕毁协议。中央决定我们自己独立研究发展核武器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研制工作突飞猛进,中央决定在1964到1965年试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。为此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,中央决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核物理系,从全国各个名牌大学抽调大三的学生到哈军工,由核武器研究院的专家直接上专业课。

我听说这个事后,又动心了。我找到父亲,提出我的想法。没想到他不但同意而且很高兴。后来我才知道,在朝鲜战场上,我军见识到美军火力的猛烈,深感我国技术装备的落后。后来斯大林建议中国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,这样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工程物理学院,培养大批技术人才。我国无力建设许多专业技术学院,就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

笑谈“我儿子失踪了”

中央最后决定在1964年10月,即建国15周年时,进行第一次核试验。我们这一期毕业生,哈军工核物理系第一期学生,就提前在1963年8月毕业。我来到了国防科委某试验基地研究所。

到了研究所,经过紧张的几个月准备,1964年5月我就进了核试验场。一天我正在一个工号忙碌,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喊我,我一抬头,看见一位戴上将军衔的人站在我面前,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张爱萍副总理,我赶忙敬礼,他却拍着我的肩膀连连说:“壮了!壮了!”其实我以前没见过他,不知他怎么得出了这个结论。他问我来新疆这么久为什么不告诉父亲。我说,不是你规定的,执行这个任务要保密,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子。我没有结婚,没有妻子,父母自然也不能告诉。

原来研究所决定我提前进场,我回家去对父母说要去执行任务,上哪去,干什么我都没说。父亲当然知道,因为当时中央还有个三人领导小组,由周恩来、贺龙和父亲负责,总指挥是聂荣臻,前线指挥官是张爱萍。这些情况我不知道,也不能知道。父亲一次在总参的会上开玩笑说“我的儿子失踪了”,张爱萍叔叔说了,第一次进场就先去找我。

吃全聚德为我庆功

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圆满成功。当时我们被要求坐在山背后,背对爆心,双手捂眼,头埋在两腿之间,心中默数60下再回头看。临爆炸时全场一片寂静,我只听到

自己心跳的声音。数了两次60下,没有听到动静不敢动,直到听见有人喊“起来了,起来了!”才转过头来,这时烟云已经很高了。我们没有看到火球和闪光,十分遗憾。有此殊荣的只有我们光学测量室的孙主任,他一人经张爱萍叔叔特批,戴着深度墨镜,一个眼蒙上纱布保护起来,用另一个眼观看。万一烧伤了,还可以保留一个好眼。

我父亲原定在北京等消息,后因要去济南,和家里秘书定好暗语,如果成功就在电话中说:“老板,买卖做成了!”可是这样的消息也不是轻易能得到的。

为了慎重,张爱萍叔叔把专家们集中在指挥所的大帐篷里,让大家发表意见。我事先做了一个简易量角器,在现场找了几位同事,合作测出了一条烟云随时间上升的曲线,和理论计算的曲线对比,结果是实际测量的曲线夹在1万吨和2万吨理论曲线之间,曲线相当光滑、漂亮。据此我给出了这次试验的数据:1.5万吨TNT当量,和美国人扔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当。我的研究室主任乔登江同志,把我叫进帐篷向张爱萍叔叔汇报,把这也作为一个证据。汇合了多方面的情况,特别是试验场回收的一些速测数据,最后证实这确实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。

年底,我在新疆做完任务总结回到了北京。半年多之后,才见到了父亲、母亲、弟弟、妹妹,因为任务完成出色,我还荣获了三等功。父亲特别高兴,特地带全家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,算是为我庆功和接风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



1961年罗瑞卿大将和家人在广州

作者简介

罗箭,罗瑞卿大将之子。1938年生于延安。1949年随“八一”小学进入北京,小学毕业后就读北京师大二附中。1958年考入中国科大原子能系,1961年转入哈军工核物理系,1963年毕业,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某试验基地,参加了我国第一次、第二次核试验,两次荣立三等功。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,被停职。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。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试验基地,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工作,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当政委,后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。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96年退休。

冯玉祥乘坐“胜利”号的死亡之旅

1948年9月1日,从纽约驶往苏联的轮船“胜利”号在航行途中发生火灾,中国将军冯玉祥遇难。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的研究查证,搞清了与当年事故有关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。

一条不起眼的快讯

1948年9月5日,苏联《红星报》最后一版不显眼处,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,标题为《“胜利”号轮船发生不幸》:“傲德萨9月4日电:八月初,‘胜利’号轮船从纽约起航,驶往傲德萨……因处置不慎,致使电影胶片着火,船在途中发生火灾。有人伤亡,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。该船已被带至傲德萨。调查仍在进行中。”这篇报道还说,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已空运到莫斯科,按照元帅遗孀的意愿,尸体已被火化。死者的几名家属、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,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。

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阿克佳布里·巴尔—比留科夫的好奇。要知道,在1948年秋,冯玉祥身死“胜利号”,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,欧美媒体纷纷报道,但苏联报纸对这一“不幸事件”却讳莫如深。

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。他想方设法打听情况,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,什

么也没有打听出来。几个月后,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,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,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。巴尔后来还打听到,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,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情况。1949年初,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。“胜利”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,后来也没有得到减刑。

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,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。1948年7月,应中共中央邀请,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。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,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。

德国船取名“胜利”号

二战结束后,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,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,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。在这些船只中,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“伊贝利亚”号。苏联船队接手后,为它起名“胜利”号。经改造,“胜利”号的载客量达到了600人。

1948年春,“胜利”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,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,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。“胜利”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,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。他的防火助理叫博金,接受过专门的防火培训。

冯玉祥转道前往中国

1948年6月至7月,“胜利”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。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,7月31日又从纽约

起航,随“胜利”号踏上了返回傲德萨的航程。在驶离纽约港时,船上只接纳了323位乘客,277吨货物。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,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。

8月31日,“胜利”号折返向西,驶向通往傲德萨。因大量亚美尼亚人离船,船上的旅客此刻只剩下310人。9月1日中午一点,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,说“胜利”号已经驶过新罗西斯克,9月2日凌晨两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。此后,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,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。

直到9月2日早晨,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,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,但没有人与“胜利”号取得过联系,也没有听说过“SOS”信号。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,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,几架海军航空兵飞机随之被派到海上。当天晚上九点钟,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,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,发现了已被烧焦的“胜利”号,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舷板。接到通报后,救援队立即从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出发,火速奔向出事船只。

苏联官方称胶片起火

“胜利”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:9月1日13时,“胜利”号班轮驶经新罗西斯克后,继续驶向傲德萨。当时的天气不错,可谓风和日丽。见船将驶向终点,代理放映员、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决定,将电影

胶片收拾一下,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。为此,他叫来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,请他在放映完后帮忙缠胶片。

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,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。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,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。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,这座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。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过程中,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,进而引起胶片起火。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,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。

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,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,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,并一边高喊救火,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。此刻,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,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。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,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。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,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,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。几分钟内,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,包括领航室、驾驶室、电台室、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。随后,火焰开始四处扩散,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,冲击救生艇甲板,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。

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,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,没能来得及发出救援信号。船长得知此情形后,命令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,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船首的铃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。接到火

警以后,在轮机长兹沃罗夫的带领,下,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。

经过全力扑救,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。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,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。

火灾责任人遭重判

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,调查人员还提出,火灾也有人破坏的可能。调查人员推测,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,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,从而引发火灾。

在不完全否认“胶片因摩擦起火”的判断的同时,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: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。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,在此次航程起航前,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,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,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,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。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,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。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,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,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,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。

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,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: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,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,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,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。

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

实,即“胜利”号从纽约出发前,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在“胜利”号即将离港前,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,要求对“胜利”号进行全船消毒。尽管船长提出强烈抗议,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。美国人强行登上“胜利”号后,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。最为蹊跷的是,在“胜利”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,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。

阻断亚美尼亚人返乡

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,他正在黑海边休假。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:“毋庸置疑,您是正确的: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,是他们在搞破坏。”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,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,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,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。

因战争造成大量减员,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,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,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。1945年12月,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,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。从1946到1948年,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。但在“胜利”号发生火灾后,苏联部长会议于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决定,完全彻底地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。

遭受火灾的“胜利”号被修复后,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。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。一直到1977年,“胜利”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。据《国家历史》